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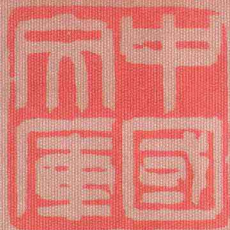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北洋军阀史

(下)

来新夏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北洋军阀史

(下)

来新夏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第五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派系纷争(下)

(1920~1924)

第一节 直奉军阀的权力角逐

一、直奉军阀的妥协与矛盾

1. 直奉两派军阀的暂时“联合”

在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由于直奉两系的联合作战,结果直胜皖败,段祺瑞只得自请辞去一切勋位、勋章及其职务,撤销了“定国军”名义,宣告下野,从而也就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战后,随着北京中央政权的易主,皖系军阀失去了往昔的骄横气焰,代之而起的是直奉两大派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也就是说,这时的北京政府已由过去皖系单独支配的局面改由直奉两方操纵共管:一是曹锟,这位直系首脑人物,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段祺瑞之后尘,坐镇保定,遥控北京政权;一是奉系首领张作霖,自居在战争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①而飞扬跋扈,抱着扩张势力的野心,坐镇奉天,对北京政府颐指气使。自此

^① 台湾中华书局编辑部:《吴佩孚传》,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之后,以大总统徐世昌为首的北京政府要想干成任何一件大事,均须征得双方的同意,否则断难施行。而且,这两大集团投靠、依恃的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又各不相同,致使直奉两系之间矛盾重重。但是,由于战争甫定,为了避免发生新的冲突,直奉两大军阀又需要相互勾结利用,于是直曹结好于奉张,奉张亦交欢于直曹,进而曹张在把兄弟的基础上,又结为儿女亲家。开始,一些重大事件均由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出面主持,曹锟则遇事妥协退让。因此,引起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的不满,但因他还是偏裨后辈,只有师长的职位,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不能起主导作用。

在奉直军阀的共同支配下,从7月22日至8月7日,北京政府接连发布命令,如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准免安福系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职;准免段芝贵京畿卫戍总司令职,并派王怀庆代理;撤销战前发布的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令;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撤销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并由陆军部收束遣散;通缉查办皖系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楨以及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的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等人;解散安福俱乐部;褫夺吴炳湘官位、勋章并免吴光新职;褫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才、张树元军官、军职,并交由陆军部惩处等^①。至于皖系军阀首脑段祺瑞,由于徐世昌以及张作霖等人为其开脱罪责并进行包庇,只允其辞职而未作任何处置。曹锟亦不便坚持己见,也就不了了之。

8月9日,内阁代理总理萨镇冰辞职,徐世昌几经考虑再次任

^①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199页;《大总统令》,《晨报》1920年8月8日。

命靳云鹏为国务总理。

靳云鹏(1877~1951年),字翼青,又作翼卿,山东济宁人,生于邹县。18岁到天津小站入“新建陆军”当兵,后升排长。1898年入随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提调。1909年由段祺瑞举荐到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辛亥革命时,蔡锷发动云南新军起义,靳抗拒革命,后兵败潜回北京。民国后,受段祺瑞重用,1913年被段保荐任第五师师长,9月署理山东都督,次年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1915年12月,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伯爵。1916年5月,调将军府将军,6月授果威将军。1917年12月,冯国璋为总统时任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3月,任北京政府参战督办事务处参谋处处长。1919年1月任陆军总长,9月兼代国务总理,11月任国务总理。1920年8月,在萨镇冰辞职后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徐世昌认为,靳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而曹锟与张作霖亦结成亲家,用这种连环的亲家关系,易为曹、张二人所接受。于是,为了均衡直奉间的关系,徐裁去四省经略使的职位,并于9月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与张作霖之东三省巡阅使的地位相埒。同时,徐邀请曹锟、张作霖共同协议四项办法:

(1)直鲁豫巡阅使和东三省巡阅使对管辖省份中的用人行政大权“得便利行事”,即曹、张各具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2)更换疆吏(如督军等人)必须共同协商,“以期内外如一”,即给予曹、张对中央用人行政的决策权。

(3)巩固(靳云鹏)内阁,不得已而更换时,应“共相示知”,即内阁人选须征得曹、张之同意。

(4)中央如有重大事件,需共助办理。

这是中央和直奉两大派系之间在权力分配上临时达成的一种协议,直奉双方在实力一度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在短暂的时间内曾出现“和平”的局面。但对许多重大问题,如对南方的和战问题、国会问题、选举问题等等均未涉及,因此他们之间只是在这一短暂时

期内有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派系间的矛盾仍在酝酿、滋生和发展之中。何况其中还有英、美、日帝国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2. 洛吴势力的上升和直奉关系失衡

直皖战后，皖系的失败使日本在华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直系的胜利也给英美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卷土重来并进而打破日本在华的独占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势力的完全失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示弱，就在皖系日益遭到中国人民唾弃和痛恨的时候，它已经在物色另一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头目——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自己的工具，以便维护已获得的权益，并继续实施扩大势力范围的步骤；而张作霖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也必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达到目的。两者之间为了各自的需要，便紧密地勾结起来了。于是，张作霖积极与日本打交道，他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表达了要问鼎中原的愿望，还提出愿意维护南满铁路日本势力的意向^①。9月，张在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更公开表示对日政策：“今后必须实行真正之亲善主义。外国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余将对徐大总统、靳国务总理、曹錕等，阐明与贵国之关系，尔后发表亲日通电。因此，今后在东三省，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日思想之传播”^②。11月，张又派他的亲信于冲汉去日本进行活动，并很快地受到日本内阁首相原敬等人的接见。同时，日本还对于冲汉表示了“可以予张以相当待遇”^③的态度，原敬首相对发展与张

①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乾元社1950年版，第24页。

②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③日本外务省档案：外务省调书，MT161411，135～141，内田外相致小幡公使电，1921年1月6日。

的关系定下了“融洽相处,使其安心”^①的对策基调。对此,《原敬日记》曾记载说:“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需要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②这一中之言,道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直奉两系军阀的后台老板不同,他们在战争中形成的这种联合也只能是暂时的,何况他们在占领地盘、收编残兵,尤其是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上,斗争异常激烈。所以,这种暂时的联合不久便随着矛盾的日益扩大而呈现危机。矛盾主要表现在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而曹锟因与张有姻娅之谊,一时还不便闹翻。

吴佩孚(1874~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后来流落到京,无正当职业。1898年到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兵。1906年升任北洋军曹锟所部管带。辛亥革命期间,他在山西娘子关一带参加镇压革命军。袁世凯称帝时,曾率军入川镇压护国军。1918年春,以旅长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在湖南攻打护法军。1919年末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的首领,吴佩孚为其手下得力干将,资历虽浅,却能征善战,深得曹锟的倚重。曹深知他能有今天这样煊赫的地位,与吴佩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常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③而吴佩孚经曹的不次提拔,累官至直鲁豫巡阅副使,成为“直系势力的灵魂”^④,与曹并称为直系的领袖人物。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因屡立战功,名声大噪而不可一世。此时,他既不买张作霖的账,对曹锟也不完全驯服。加之英美等国在华势力又看中吴佩孚是可资利用的工具,在报章上把他吹捧成中国唯一的“英雄”,使得吴佩孚自己也颇为自负而有“舍我其谁”之

①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乾元社1950年版,第135~136页。

②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

③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6页。

④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2页。

感。尤其对直皖战争中奉系作用的想法而对张作霖颇有触怒。张作霖认为，直皖战争如果没有奉军参战，直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的倒向是这次战争孰胜孰败的决定因素。吴则认为，奉军参战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这次战争决胜负的关键一战是松林店一战，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张作霖在战后抢夺大批辎重武器及财物，且“将战时所获军用品，装车百辆运奉”^①的举动，尤为“愤懑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②。吴又认为，既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而他的政治主张理应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应当说，吴佩孚不仅懂得军事战，喜用策略，而且也颇谙政治战，善抓题目。还在他驻兵衡阳时，就曾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另立新政府的野心。所以，当美国议员访华团团团长芮恩斯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的建议时，吴佩孚立即抓住这一时机，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于是，他立即大造舆论，趁英美记者访问他时，在关于时局的问题上，便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意见。他说：“国号共和，以民治国，欲求真正和平之解决，唯有组织国民大会，提交会议，此乃民治之真精神。”^③进而又于1920年8月1日发出通电，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具体办法，胪列大纲八条：

(1)定名为国民大会；

(2)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

(3)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藉口破坏；

(4)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学会，宁缺勿滥。再由全

①《申报》1920年8月11日。

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56页。

③中外新闻社编：《吴佩孚全传》，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版，第10页。

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5)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6)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会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7)经费由各省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8)限期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

同时,他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解决^①。他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为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由皖系所扶植的大总统徐世昌,另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但是,按照吴佩孚规定的办法选出的“国民代表”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国民大会”也只能是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装饰品。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得到不少团体和个人的响应和赞同,如上海为此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体,易宗夔则专题写了致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信说:“南北分裂,帝制和复辟的发生,谁不是借着民意来作恶?以至于互相倾轧,互相讨伐;得胜的便乘机占夺地盘,失败的便投降仇敌以保持利禄;财用匮乏了,便借外款,加赋税……去年‘五四’、‘六三’运动,就是真正民意第一次的表现;今年的安福部失败,就是真正民意第二次的表现……所以吴师长极力主张开国民大会就是明白这种趋势了。”^②然而,吴的主张却遭到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等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张作霖,他认为吴佩孚不过是曹锟手下的一个师长,所以对他

^①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湾传记文学社印行,第596~597页;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会编:《吴佩孚先生集》下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349页。

^②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十辑第三册,第222~224页。

甚为轻视。当记者询以对吴的印象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并在接见日本记者时又强调“国民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①。为此，张作霖还当面质问曹锟，而曹当即表示他并不赞成这个意见，同时表示负责叫吴予以撤销。事后，曹锟通电声明：吴佩孚的通电未征得他的同意，“应予撤回”。后来，由于日本的干预和张作霖等人的坚决反对，特别是直系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吴佩孚炮制的“国民大会”的计划未能实现。

3. 直奉矛盾冲突下的北京政府

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的恶感在日益加深，曹锟与张作霖之间争权夺利的严重矛盾也时隐时现，北京政府夹在直奉两系军阀之间更是无所适从，而面临的一些迫切的问题又急待解决。如国会问题，战后除广州有一个旧国会（即非常国会）外，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已自动宣布停会。北京政府为此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改选，亦无人响应，且遭到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因此，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在内阁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对于由靳云鹏组阁，因靳与张作霖是亲家，与曹锟是结拜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所以直奉双方一致同意靳出任阁揆，但在内阁成员的安排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后几经协商，内阁成员才确定下来，他们是：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内务总长	张志潭
财政总长	周自齐
陆军总长	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	萨镇冰
司法总长	董 康

^①台湾中华书局编辑部：《吴佩孚传》，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

教育总长 范源濂

农商总长 王迺斌

交通总长 叶恭绰

其中,只有张志潭属于直系,王迺斌属于奉系,而周自齐、叶恭绰以及内阁总理靳云鹏都倾向奉系。由于内阁中奉系势力雄厚,北京政府在处理直奉间利益的问题上,往往偏向奉系,常常引起直系的强烈不满。内阁外而因直奉两系的大小军阀为权力地位的分配闹得不可开交,内而因旧交通系首脑梁士诒企图取代阁揆进行倒阁活动,更是一筹莫展。加之,1921年2月4日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当地驻军被迫退出库伦,边防吃紧,北京政府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令其派兵“援库”,然而张得款后却按兵不动。总之,成堆的问题有待北京政府解决。为此,1921年春,内阁总理靳云鹏迫于形势的发展,决定邀请曹锟、张作霖到京举行会议,以便解决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继李纯逝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并已取得“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军阀,故亦在被邀请之列。

经过靳云鹏的再三邀请,4月15日张作霖来到天津,随后曹锟于16日亦抵津,两人建议会议改在天津举行,对此,靳云鹏只得迁就,于18日自京赶赴天津与会。王占元因河南发生战事,火车不通而受阻,未能及时赶到,直到25日才抵津门。于是,会议便于是日在曹锟的住宅曹家花园举行。这次天津会议又称“巡阅使会议”或“北方四巨头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张作霖、曹锟进行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政治分赃会议;而王占元因其实力远在张、曹二人之下,所以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

会议首先遇到的是南北统一问题,因为北京政府正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好渡过财政难关。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易于解决。当时,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来拆孙中山的台。张作霖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并建

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负责“讨伐”任务，因为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尚有 40 余营计 2 万余人在江苏、安徽两省，这样可为奉张“伸手长江流域”^①预作准备。曹锟没有正面回答张的建议，而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曹、王并提议派张勋为“征库总司令”，后遭张作霖否决，而靳云鹏亦惮于全国之反对，不敢遽以苏皖赣许张勋。但起用张勋，为奉张全力所争之事，故而又为其谋巡阅热察绥一职，亦未通过。4 月 27 日，遂决定联名发一电报，谴责广州非常国会另组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破坏统一，但只字未提“讨伐”之事。电报除曹、张、王列名外，又拉南北一些督军、省长充数。可是，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等都声言事先未征求他们的同意而代为列名，并对此深表不满。至于“援库”问题，曹、张二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由湖北出兵两师，然而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八师从湖北调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演出了一场闹剧：就是奉张为援库征蒙已从北京政府领得军饷 200 万及开拔费 100 万，直曹仅索得欠饷 50 万元，列席会议的曹锟之弟、直隶省长曹锐很不服气，当场与内阁总理靳云鹏发生冲突，以至靳愤而提出辞职。后经张作霖、王占元再三劝慰才平息下来，并由曹、张、王三人联名于 4 月 28 日发出一个拥护内阁的通电，谓“靳揆自上年安福倒后，重组内阁，身膺艰巨，措施国务，殚精竭虑，裁兵减政，积极进行，功绩甚伟。近因财政竭蹶，内政纷扰，致萌退志。锟等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政外交，非靳莫属。业于沁晚会议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除经电劝慰外，各省同胞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阁，以奠邦本，不胜祈祷。”^②这样，总算挽回了靳的面子，平息了全国的舆论，靳才不再提出辞职。自此以后，会议开得更为松散，“四巨头”每天打麻将、叫堂差、征歌选色、饮酒取乐，

①《申报》1921 年 5 月 6 日。

②《申报》1921 年 5 月 3 日。

偶尔抽时间讨论一下军国要事,也是意见歧异。5月5日后,三巡阅使应徐世昌邀请赴京,在公府举行联席会议,协商分配权力和地盘问题,直到5月下旬,三巡阅使方散会离京。

总之,天津会议经过一个多月讨价还价的争吵,终于达成了妥协,大体结果是:直系取得了陕西的地盘,并使奉系撤走了驻河南、陕西的驻军;而奉张达到了兼署蒙疆经略使的目的,并在关外三省及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内扫清了奉系以外的势力。尽管如此,奉张对垂涎已久的长江流域,因已多属直系,一时难以伸张,仍感到不能满足。5月,靳内阁为排斥旧交通系分子而提出总辞职,但这个夹在直奉系间的烂摊子又无人敢接。14日,靳云鹏又受命重新组阁,阁员为: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内务总长	齐耀珊
财政总长	李士伟
陆军总长	蔡成勋
海军总长	李鼎新
司法总长	董康
教育总长	范源濂
农商总长	王迺斌
交通总长	张志潭

齐耀珊、王迺斌接近奉系,蔡成勋是吴佩孚的把兄弟,又将旧交通系分子周自齐、叶恭绰排挤出阁,直奉之间暂时取得了妥协。然而,“自此奉、直两系各尽力以图本系势力之扩大,而每经一度之发展,两方即不免暗中有的一次之冲突,结果则各得相当之交换,以维持其势力,而暗中更各竭力相斗”,“靳云鹏方执中央政柄,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势为务,使两系利害,不致过于冲突”^①。这就是当

^①张梓生编:《直奉战争纪事》,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时靳云鹏依违于两大之间，以维持其内阁之位置的写照。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直奉军阀在直皖战争中的“联合”，正是这种“暂时的妥协”，而就在他们“联合”的时候，即已开始孕育着新的战争。而且，张作霖为了对付直系，这时便同皖系的残余势力以及广东的孙中山加强联系，为日后结成反直联盟奠定了初步基础。

直皖战后，张作霖为准备对直战争，更加积极地乞求日本的援助。1922年1月8日，张即派日本顾问町野中佐向驻华公使小幡转达自己的意旨：“我（张作霖）没有和吴（佩孚）合作之意。当此之际，有两种途径：一、暂时静观形势，等待吴积极行动，消极防卫；二、我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的意见如何？”^②当时，日本政府有两种不同意见：小幡公使等主张采取静观态度；陆军方面则主张援张，他们认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中国的权威，使我对华尤其是满蒙政策有从根本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③因此，“当此之际，（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吴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吴为傀儡的阴谋，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帝国地位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④。1月19日，内田外相在一封密电中则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48页。

②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241～258页。

③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530～533页。

④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328～329页。

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①

4月21日,日本外务省正式起草了一个《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三条^②:

第一条,“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将、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作为张作霖的顾问,在(军事行动)只限于中国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的任何军事行动”。

第二条,“以适当的方法与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我方针不致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的公正不倚的态度”。

第三条,“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

这就是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没有采取积极援张的方针,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又重新回到亚洲,打着“门户开放”的口号,订立了《九国公约》,建立起共同侵略中国的新体制。而且,日本对奉张的态度,已预兆着直奉战争对奉系不妙的前景。

直奉军阀共同把持北京政府,事实上就是英、美、日为北京政府的共同主人。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主宰中国,这就必定要排斥另一个对手,这样,也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矛盾不断恶化和必须采取分裂中国而加紧扶助各自势力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

①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②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看，直奉军阀的“联合”，本质上只能是暂时的妥协和“联合”，而矛盾的不断恶化乃至分裂则是必然的结果。

二、直系军阀势力的扩展与“联省自治”运动

1. 吴佩孚练兵备战

1920年直皖战争后，各派军阀势力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直、奉两大派系既成为共同控制中央政权的合作伙伴，又成为争权夺势、互相排斥的对手。直系在击败实力雄厚的皖系后虽然未能独操中央政府的权柄，但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优势，再加上英、美势力的舆论倒向，使直系势力迅速膨胀。奉系则乘直皖战争之隙扩展了实力，而且已经把触角伸延到关内，皖系败后，历史把它推上了与直系军阀成为直接对手的地位。但就军事实力而言，奉系稍弱于直系。为了与直系抗衡，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急于联络各方面的反直力量以壮声威，于是才有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出现。面对奉系的幕后活动，直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深知奉张的用意，何况，所谓奉、直斗争，实际上就是张、吴的斗争，这就促使吴要趁机发展军事实力，以便在中央政权中压倒奉系，最后以武力“统一”全国，形成“直系即中央”的一统局面。

吴佩孚在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之后，立即遭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甚至连曹锟也没有予以支持，使吴佩孚意识到，他自己支配北京政权的条件还远未成熟，也就是说他的实力还不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局面，迫使他下决心扩充自己的力量。于是，他把自己统率的第三师全部撤回其盘踞的洛阳，以示“不问朝政”，并决定在此埋头练兵，扩大实力。

洛阳素有“九朝故都”之称，关帝庙位于城南7公里处，是我国三大关公庙之一，据说三国名将关羽之头颅就埋于此。吴佩孚崇拜关羽，并以“关公”自况，他认为洛阳为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适

中,在此驻兵,则居中可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况且“洛阳居天下之中,最便于发号施令以抚辑四方”^①,而巩县兵工厂就在近旁,武汉、南京兵工厂有京汉、津浦、陇海铁路运输,武器弹药供应方便。可是,当时河南的督军是赵倜,在直皖战前,赵是反皖八省同盟之一,战后他一无所获,而河南却成了直系的屯兵场所:冯玉祥驻兵信阳,萧耀南驻兵郑州,吴佩孚驻兵洛阳。尤其吴好大喜功,获得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头衔后,建立庞大的使署,颐指气使,俨然成了赵倜的顶头上司。在这一情势下,赵倜为了对付直系,转而投向了奉系。

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名义,除由他直接统辖的第三师外,还有由直隶第一混成旅扩充的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由直隶第二混成旅扩充的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以及阎相文的第二十师,总计约有5万人的兵力隶属于他的麾下。他在大练兵时大体做出如下举措:

(1)扩充师旅,补充兵员。吴将随他南征北战的一大批军官逐级提拔,他所属的大多数旅长晋升为师长,如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张福来等人。这些人的官升了而兵不足,于是他大量招兵买马,补足各师兵员。

(2)参照古今中外战史、兵法,推行以步兵为主,以连为单位进行操练;努力提高中下级军官的军事素养,讲授战地指挥、兵器使用、构筑工事等军事科目,培养军官、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②。吴佩孚不仅从制订大纲到具体作业都事必躬亲,而且还亲自授课,大讲孔孟之道,向官兵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以使他们树立忠于他本人的思想,诸如“军之宗旨,尤贵服从,将之御士,尤贵同心,务使将兵一体,如身臂相依,指挥

^①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会编:《吴佩孚先生集》上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82页。

^②武德报社编:《吴佩孚》,北京武德报社1940年版,第80页。